

# 手机媒体，后现代主义的新载体

## 一、手机媒体

据 CNNIC《第 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sup>1</sup>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5.38 亿，其中手机网民达到 3.88 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手机网民的数量首次超越台式电脑网民的数量；中低端智能手机降低了上网门槛，使用手机收看视频的用户已经超过 1 亿人。

随着 3G 时代的来临，手机不仅能随意通话，还能以高速即时浏览网页、参加电视会议、观赏图片和电影以及即时炒股、收听音乐等，无线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迅速融合，手机开始突破通讯终端的角色，完成向信息终端的身份转型。

2013 年，将是手机媒体的 4G 元年，手机媒体的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目前，手机媒体的范畴已脱离早期手机报刊、手机电视、手机 WAP 网站等初级过渡形态，形成了以用户和分类信息为基础、以移动网络为驱动和平台、以手机用户需求为导向，为受众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信息，并且集合新闻、娱乐、生活、政务商务等方方面面服务的多功能媒介平台。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以传播者或大众群体为中心的传播圈内容构建不同，手机媒体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构造传播的媒体，每一个人都有望成为自己信息圈的主角。

正如麦克卢汉在其著作《媒介即讯息》一书中指出：一种新的媒

---

<sup>1</sup> <http://www.isc.org.cn/zxx/ywsd/listinfo-21627.html>

介一旦出现，它必然带来媒介生态结构的改变，进而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代表了某种时代的信息，承载着某个时代的精神。**

##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 60 年代，并于 70 与 80 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其本质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后现代”是与“现代”相对应的词。后现代主义的“后”表达了“反对”的意思，即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它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是时间概念，表示了现代主义结束后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人的死亡”，根本否定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巴尔特（《作者之死》）反对把作者看成是作品意义的最终确定者，拒绝理性、知识、法则。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型”决定了知识、决定了社会，从而决定了人，因而，在知识和社会的发展上，人都不起作用，因此他断言“人类已经死亡”。既然“人已死亡，价值也就无依附之所，因为价值总是与主体的人相关的。

后现代主义是以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力、颠覆传统，反主流、反文化、反传统、否定一切终极价值为特征。西方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以“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几个基本特征包括：相对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

心，后现代主义则以强调内在**联系**的实在性为特征；第二个理论倾向是它的**整体**有机论；强调过去和未来之间有一种新的**时间联系**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理论倾向；第四个理论倾向是它的**创造性和多元论**的观点。<sup>2</sup>

### 三、以往研究

“对于我们，‘后现代’突出了当下时代中卓越的和新颖的东西。它唤起了对非连续性、断裂感的重视，众多新奇的信号正在出现，并需要新近的分析、理论和实践”<sup>3</sup>。在此背景下，对于后现代主义和手机媒体两者的交叉研究，主要代表研究有王秋艳和聂晶磊的《手机媒体对麦克卢汉理论的诠释及拓展》，认为媒体的不断发展印证了麦氏对“地球村”、“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预言<sup>4</sup>；翁立伟的《新媒体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论析》，主要把手机和互联网作为两个独立的方面进行讨论<sup>5</sup>；卢家银和段莉的《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透视》，认为手机媒体的后现代特性集中表现在它对于时空的重构、对于沟通的“脱域”、对现代文化的消解和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特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新的构筑。这些特性将随着手机媒体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延伸和发展，较为全面地概况了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等<sup>6</sup>。本文将手机媒体作为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载体进行研究。

---

<sup>2</sup> 第二部分内容参考解玉喜老师上课 PPT.

<sup>3</sup> 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1, p.2.

<sup>4</sup> 王秋艳 聂晶磊,《手机媒体对麦克卢汉理论的诠释及拓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sup>5</sup> 翁立伟,《新媒体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论析》,当代电影,2011年第6期.

<sup>6</sup> 卢家银和段莉,《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透视》,东南传播,2006年第7期.

#### 四、新媒体，新载体

随着手机技术的进步和手机“媒体化”的深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接入，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在手机媒体空间中日渐模糊，人作为**主体日渐消解**；手机的随身性、便携性和移动性，加上手机号码的实名指代特征，使得手机媒体相较互联网更能深入地模拟客观真实，从而**瓦解了旧的时空秩序**；手机作为一种媒体超越了地域、时间和电脑终端设备的限制，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新载体；手机媒体对于中心的消解和背离，对权威的抗拒和否定，体现了**追求创造性和多元化**；“媒介即讯息”，体现了载体和个人、社会处在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中。

##### （一）“人的死亡”：主体的消解

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体的人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主体的消解是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新媒体传播方式及其所构建的传媒生态体系的一大特点。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主体与客体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消解、融合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也由此消

失。浸润在后现代主义精神中的新媒体在主体消失之后便失去了真实感，一切都成为虚假、复制、类像；没有了风格，只有对于风格的模仿。人变成了新媒体所统摄下的机器、符号、程序，因而，“现代人昔日的孤独、焦虑和畏惧等情感随着人的主体一起被掏空了，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被抽掉了，成为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失去了生命意义的人”<sup>7</sup>。

从社会层面来看，手机媒体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络，看似充分融入了人的社会性和个性化特点，但本质上却是对人的“物化”。在手机媒体所构建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手机号码，成为各自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身份标识，各个相互联系的手机号码就组成了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络。手机号码就充当了互联网 IP 地址的功能，使用这个手机号码的用户则变得毫无差别，而且无关紧要，每个人都成为手机号码背后的操作者，变成了被物化的个体，失去了原有的主体性。

## （二）时间空间的重构

手机媒体使**互动**的“地球村”变成了**移动**的“地球村”正在成为全球几十亿人的共识。有了卫星电视、互联网之后，全球生活同步化，网络生活同步化、时空差别不复存在，电子信息瞬间可达海角天涯。人类居住的地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有了互联网以后，数以万计的人在网上积极地交流，网上的“地球村”充分地体现了互

---

7 曾言兵，《后现代主义精神与魏晋玄学》，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4页。

动性、即时性，交流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可能随时携带“庞大”的电脑显示器，即使是笔记本也仍然限制了交流的快速、便捷。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开发与使用，“地球村”不仅成了互动的“地球村”，而且成了移动的“地球村”。手机媒体成为人的综合器官的延伸。手机作为新一代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是前面四种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延伸，延伸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根据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手机最初是一种偏向空间的媒介，缩短了传播双方的空间距离。随着手机媒体的多媒体化发展，它的接收内容和储存量迅速扩张，开始有了偏向时间的特质。手机延续了时间，开始彻底重构时空。保罗·维利里奥在其关于后现代时空理论“速度学”中阐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了在交通、信息、电讯、计算机等模型中，随着时间的流离失所，一系列技术变化所引起的界线崩溃。这些变化的早期形式导致空间安排上的变化，尤其物理边界的崩溃。他认为速度的增加有助于消蚀空间上的差异并且使得将空间从时间上区别出来变得日益困难。此外，速度逐渐制服了距离，“加速度和减速度，或运动的运动只是空间、加速空间、飞行球状空间的真实尺度”。维利里奥创造了“速度距离”这个要领，并认为它有助于消灭物理的和空间的维度。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住处和电讯传播方式上所取得的那些进步。在后现代世界，时间比空间更重要。<sup>8</sup>

---

8 瑞泽尔（美），《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 第192页。

### （三）创造和多元：抗拒中心与权威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深度模式的消解，即中心的消解。后现代主义从“去中心”出发，认为万事万物没有表象和本质的区别，不存在事物背后的本质和权威的个体，“事物的本质不是被决定的，而是开放的；事物的性质不是由最高最后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事物与它的关系决定的”。<sup>9</sup>由此可见，手机媒体对于中心的消解和背离，实际上意味着对权威的抗拒和否定，追求创造性和多元化。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权威的信息与草根、个人的信息发布并行不悖，权威信息的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考验和质疑，而草根信息的传播渠道日益畅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了社会舆论和议程设置。

“去中心化”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在手机媒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作为通讯工具还是作为大众媒介，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始终带有点对点的互动特质，每个手机用户都是平等的个体，人人都是中心，人人又都不是中心，人们在手机媒体这一新载体上能够充分感受到无中心、无权威的文化精神以及自由、平等的信息传播理念。具体说来，语音通讯、手机短信等以点对点信息传播为主的手机应用自诞生之时就不存在集权和中心化的问题，而手机游戏、手机广播电视以及移动互联网等具有大众传播色彩的手机应用，其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天然地具备市场细分所带来的个性化特征，因此同样具备无中心和反权威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

<sup>9</sup> 曾言兵，《后现代主义精神与魏晋玄学》，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2页。

#### （四）整体有机论：“媒介即讯息”

手机媒体对“媒介即讯息”的拓展。“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是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sup>10</sup> “我们对任何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sup>11</sup> 例如上网的过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具体内容。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同样大大超过它所传递的具体内容。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它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麦克卢汉则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媒介即讯息”，它们是处在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中。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这一点已经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所证实，手机媒体这一新载体的出现也进一步印证了麦氏的观点。

---

10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33页。

11 [美]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五、结语

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指出，“随着事实与虚构的混淆，媒介将历史非真实化为一种发生，科学将其自奉的模式当做唯一可取的现实，控制论把人工智能之谜摆到了我们面前，技术工艺将我们的感知投射到不断退缩的宇宙的边缘或深入到物质不可思议的缝隙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消解了”。<sup>12</sup> 后现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人们或感叹“一切皆支离破碎”，或宣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或救戴“世间唯有想象：它们是唯一的存在”，或预言“这一切都是变化即将来临的前奏……” 在惶恐、无序与混乱中各种新兴的话语在萌发、在激荡，这些话语甚至是彼此矛盾、相互竞争的。于是，在后现代的领地里，充斥着杂乱不堪，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个立场间还缺乏基本的一致性，而各种后现代的话语也是彼此争锋。而手机媒体作为集传统媒体功能于一身的新媒体，理论上为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现实上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表现载体。

---

12 [美] 哈伊布·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 参考文献：

- [1]曾言兵,《后现代主义精神与魏晋玄学》,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2页和第104页.
- [2]卢家银和段莉,《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透视》,东南传播,2006年第7期.
- [3]王秋艳 聂晶磊,《手机媒体对麦克卢汉理论的诠释及拓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 [4]翁立伟,《新媒体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论析》,当代电影,2011年第6期.
- [5]保罗·莱文森(美),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6]瑞泽尔(美),《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92页.
- [7]哈伊布·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 [8]马歇尔·麦克卢汉(加),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33页.
- [9]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1, p. 2.

**作者简介:** 李昕茹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人类学系 2012级研究生。